

1814

XIANGXI
WENSHI
ZILIAO

湘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199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湘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湘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主 编 张二牧 副主编 杨伯熙
责任编辑 傅冠群 谢心宁

《湘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发行
(吉首市团结西路8号, 电话3833)

邮政编码 416000

湘西自治州民族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5 字数: 130千字

1991年8月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50元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6849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012/K

ZA38/01

- 主 编 张二牧
- 副 主 编 杨伯熙
- 责任编辑 傅冠群 谢心宁



教育史话

- 〔1〕皖籍师生流亡湘西……………刘敬坤
〔34〕先父肖涵熙从事教育工作轶事……………肖翼昌
附：《痴斋闲墨拾零》前言……………彭秀模

民族艺术

- 〔41〕苗剧创始人石成鉴……………张二牧
〔45〕民乐曲曲壮中华
——记著名土家族扬琴演奏家胡运籍……………潘清泽 吴云城
〔49〕记民间艺人吴庆忠……………罗应贵
〔52〕王云川其人其事……………彭图湘
〔57〕龙山现存的土家族音乐舞蹈……………吴进娥

苏区文化

- 〔64〕湘鄂川黔苏区的红军标语……………刘 莉

体育天地

- 〔70〕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武术……………秦可国
〔103〕湘西经武学校……………刘建威

- [106] 武术师邓德达……………泸溪县志办
- [108] “南北大侠”杜心五……………周保林
- [114] 龙山“南强”球队打败驻来凤美国空军球队……………李传森

出版社介绍

- [119]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出版社的始末……………骆正南

工商史料

- [122] 解放初期从王村抢运食盐……………李大桂
- [129] 永顺建永织布厂开办经过……………姚茂松

社会掠影

- [136] 从胶东受降到回湘参政……………田仲达
- [146] 难忘的岁月……………杨丙莲口述 颜家龙整理

补 白

江西人在大庸经商点滴 (105)

乾城解放点滴 (118)

解放前的保靖赌场 (56)

郁达夫亲访沈从文 (51)

地理学家吴壮达教授 (40)

历史的必然选择——评《从两把菜刀到南昌起

读者·作者·编者 (145)

义》 (69)

皖籍师生流亡湘西

刘敬坤 *

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1953年以前叫所里镇，在清代，乾城县为乾州（直隶）厅，与永绥（直隶）厅、凤凰（直隶）厅、晃州（直隶）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特区”（按清制，直隶厅或为边防、海防要地，或为少数民族聚居之特区）。在古代，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五溪蛮”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曾是东汉时马援（伏波将军）征“武陵蛮”的用兵之地（湘西伏波庙颇多），也是清代前期傅雍（谥号壮肃）“平苗乱”的地方（乾州厅和永绥厅有傅壮肃祠）。辛亥革命后，民国废厅存县，改永绥厅为永绥县、乾州厅为乾县（因与陕西乾县相同，后改为乾城县）、凤凰厅为凤凰县、晃州厅为晃县。不久，这个地区又成了陈渠珍的地盘。陈渠珍是凤凰县人，曾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前的军阀纷争之际，他占有湘西十来个县的地盘，人称“湘西王”，约有一个军的兵力，以凤凰为首邑，

* 作者系原安徽省立颍州中学学生，后为国立八中初二部学生，曾在国立八中高二部、高三部、高一部读书，1944年毕业于高一部，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为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81年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现已离休，仍主持编绘《中华民国政区地图集》工作。

设兵工厂，办电厂。这时，湘川仅公路和川黔公路都还没修筑，陈渠珍统治下的湘西十来个县，不仅是兵家征战之地，而且是崇山峻岭的交通闭塞之区。1928年国民政府基本上统一全国后，陈渠珍除了更换五色国旗为青天白日国旗，接受国民政府的官位，实际上一切都还是照旧。

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看到淞沪战场上我军已处于不利形势，东南沿海地区很可能要沦于日军，于是特派刚刚卸去淞沪战场作战总司令的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将军，迅速由家乡（时张将军在故乡洪家疃休养）赶赴湖南，接替何键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同时，陈诚将军由淞沪战场上的左翼作战军总司令调任防守江防的第七战区副司令（司令长官为刘湘），1938年初，接替何成浚将军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蒋介石作这样的人事安排，是从长期抗战的全局来考虑的。因为此时四川境内的地方实力派对于国民政府下属的政治、文化机关西迁入蜀，总认为“国府西迁，会吃掉我们”。处在如此情况下，沿海地区的沦陷已迫在眉睫，而政府的西迁入蜀又不能完全执行，所以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当轴诸公就决定，第一步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机关、学校先迁至武汉，再转至湖南。而湖南省政府主席却是一位不明世界大事和国内形势的何键，只知道尊孔读经，规定女学生穿裙子不能短至膝盖。当然，用这样一位迂腐的省主席是不能适应抗战形势需要的。蒋介石就以抗战时期军人主持地方政务为由，撤换了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蒋介石在1935年和战略家蒋百里及地质学家丁文江多次讨论过抗日战争的全局战略问题。蒋百里先生认为，中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将沦于敌手，中日双方最后决战的地带必将在洛阳、襄阳、衡阳一线以西地区。现在台湾国民党人撰述的《抗日战史》中，包括蒋纬国先生编的十卷本《抗日战史》都反复讲到“三阳”以西

为决战地带。这话最早是蒋百里先生与蒋介石谈话时说的。丁文江先生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和国防地理学家。丁先生1935年曾在报刊撰文，大声疾呼：“中日之间一旦开战，我国的最高统帅部至少要在湖南芷江以西。”1935年行政院铁道部急调正在赶修陇海铁路的该路局长凌鸿勋（时陇海铁路已修至西安，正向西赶工修筑）出任粤汉铁路局长，并限定1937年以前使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粤汉铁路北段仅武昌通至衡阳，南段仅广州通至韶关）。丁文江先生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名义，于1935年12月受行政院委派至湖南考察，其任务有二，其中之一为勘定沿海学校内迁的校址问题。丁先生不幸在衡阳煤气中毒，因抢救不当，遂逝世潇湘。

凡此皆足以说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轴诸公，在抗战前就已经考虑到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1937年11月张治中将军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既不能当成什么“国民党吃掉非嫡系地盘”看待，也不能当成国民党一般的人事安排，而是包含着长期抗战的战略意义的。

二

抗战以前，我国的中等教育体制大致沿袭清末民初的格局，每省在旧府治设省立中学一所（视各地教育发达情况，有的为高初中，有的仅有初中）。就安徽来说，清代为安庆、徽州、池州、宁国、太平、庐州、凤阳、颍州八府，到抗战时，原隶清代的八府，每一府治所在地都有省立中学（包括高初中）一所、省立师范一所、省立女中一所。只是旧宁国府属不称宁国，而称宣城中学、师范、女中（宁国府治宣城）；旧太平府属不称太平，而称芜湖中学、女中（无师范）。太平府治当涂，但芜湖开为商埠后，更为兴盛。总计抗战前安徽的省立中等学校有安庆高中、安

庆初中、安庆女中（包括初中）、安庆师范、庐州（合肥）中学（高初中）、庐州女中（高初中）、庐州师范、凤阳中学（高初中）、凤阳女中（高初中）、凤阳师范、颍州（阜阳）中学（高初中）、颍州女中（初中）、颍州师范、徽州（歙县）中学（高初中）、徽州女中（高初中）、徽州师范、池州（贵池）中学（高初中）、池州女中（高初中）、池州师范、宣城（即旧宁国府）中学（高初中）、宣城女中（高初中）、宣城师范、芜湖（属旧太平府）中学（高初中）、芜湖女中（高初中），另外还有省立滁州中学（仅有初中）。这时的安徽省教育厅长为杨廉。

因为安徽与江苏毗邻，又距当时的首都南京很近，所以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安徽全省受到极大的震动。省政府主席蒋作宾是个文职官员，面临危局，一时不知所措，仓促把省政府迁到六安；皖中和皖北的各公立、私立学校都无形宣布散学，或临时迁家乡间。地处皖北的省立颍州中学校长苏家祥（字瑞堂），与省立颍州师范校长王贤敏（字逊甫）却能沉着应付局面，坐镇校中。省立庐州中学校长高达观为留法学生，在南京失守后（南京至合肥仅300余华里）把庐州中学迁至舒城乡间晓天镇。

1938年1月25日，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将军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主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徐州，安徽省政府设六安。这时已是台儿庄战役前夕，李宗仁在六安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以军务繁忙为由，将安徽省政务交由李义纯军长（桂系将领，合肥人）代理。李义纯征得李宗仁同意，与教育厅长杨廉研究恢复安徽的教育问题，决定以原凤阳中学、凤阳女中、凤阳师范为基础，设置安徽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校址设安徽霍邱流陂疃、麻埠，校长为谭植菁。以省立庐州中学、庐州女中及庐州师范为基础，设置安徽省立第二临时中学，校址设舒城晓天镇，校长为顾访白。以芜湖中学、芜湖女中为基础，设置安徽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址设岳西。以省立宣城中学、宣城女中、宣

城师范与池州中学、池州女中、池州师范为基础，设置安徽省立第四临时中学，校址设秋浦（今东至县）。各临时中学均同时招收县立及私立中学转学插班生。徽州中学、徽州女中、徽州师范地处皖南山区，颍州中学、颍州女中、颍州师范地处皖西北，仍继续开学上课。颍州女中校长在南京失守混乱时，擅自离校，省教育厅给予撤职处分，由颍州中学校长苏家祥兼任颍州女中校长。

1938年2月中旬，安徽省立的四个临时中学及颍州三校、徽州三校和迁至岳西的安庆中学均开学上课。

三

1938年5月上旬徐州会战初期，颍州中学因地近徐州，风传将迁校河南潢川。5月17日徐州失守时，教育部长陈立夫派出十位要员分赴战区各省考察教育情况及学校的搬迁问题；派到安徽去的两人，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方治（字希孔，桐城人）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的邵华（字健工，颍上人）。方治是留日学生，三十年代初从日本回国后，即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职，后来成为国民党CC系的重要成员和中宣部的实权派人物。邵华于颍州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读书，和周扬（即周起应）在大夏时同学。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邵华是上海学生运动中的一个风头人物，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邵华到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任宣传部干事，并参加了改组派，后来又由改组派参加到CC系中。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方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邵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方、邵二人由武汉到达六安时，芜湖、宣城、合肥、蚌埠等

地都已沦陷，安徽一度陷入混乱状态。方、邵二人自武汉出发时（武汉为当时我国政治、军事的指挥中心），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指示方、邵二人说：“现在共产党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如果我们对战区各省的学生不采取积极措施，这些青年学生很可能都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你们二人这次到安徽去，要尽最大的可能把安徽的各省立中等学校迁到武汉来。这些学校的师生到了武汉以后，教育部考虑设立国立安徽中学来安排他们。”方、邵二人把四个省立临时中学的校长电召到六安，说明当前的军事形势及教育部的战时措施，征询四校的校长对迁校武汉的意见；四校长看到目前的军事失利形势，迁校武汉势在必行，都一致同意迁校。正在此时，方、邵二人在六安省教育厅看到颍州三校苏、王二校长由河南潢川发给教育厅的告急电报，一面催促四个省立中学校长迅速返回驻地，立即组织迁校；一面专车由六安急驰潢川。

原来5月17日徐州失守后，颍州中学兼颍州女中校长苏家祥和颍州师范校长王贤敏日夜奔波，向五战区有关方面寻求解决迁校问题。阜阳距徐州300多里，是徐州失守后我大军西撤的指挥中心，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此时正在坐镇阜阳，指挥大军西撤。苏、王二校长就设法晋谒李宗仁，请示迁校问题。李氏当面回答，颍州三校（颍州中学、颍州女中、颍州师范）迁往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潢川。

5月23日上午，苏、王二校长请示了李宗仁将军后，中午立即返校宣布“明晨开始迁校，颍州中学初中部一年级三个班、颍州女中全部及颍州师范简师班24日晨四时出发，其他两校各年级学生于25日晨出发”。这时已是初夏季节，小麦快成熟了，淮北原野上一片金黄。我当时是颍州中学初中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也和大家一样，怀着满腔国破家亡的悲痛，唱着《松花江上》歌曲，走出了颍州中学的校门。时隔半个世纪，于今思之，犹不觉潸然泪下。记得我们走出校门口时，国文教员陈遐甫先生流着泪水对

我们哀诵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大约上午九时半左右到了四十里铺，不料日机九架沿公路飞临上空，幸好我们平时都已受过防空知识的教育，大家迅速散至路旁麦田中，没有被日机发现。这九架日机是专来轰炸阜阳城的，一个不足五万人口的阜阳城区，日机竟投弹200枚。后来我们到了永绥（今花垣）后，苏校长的“跟班”李春晓对我们说：“日本人得到汉奸的情报，知道李宗仁在阜阳指挥大军西撤，所以出动九架飞机来轰炸阜阳。那天，李宗仁确实在颍中高中部楼上办公室里和苏校长谈话。因为颍中在城外两三里乡下，树木又多，日本飞机没有发现目标。”

颍州三校的先头队伍当天就住宿在六十里铺，阜阳已被炸成一片焦土。苏、王二校长决定颍中、颍师全部师生当夜出发，所有图书仪器及教学用具一律上船装运，由颍河下驶至正阳关，然后转入淮河上驶西行至潢川。

约于6月10日左右，颍州三校师生均已到潢川。此时的潢川正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南北两城全是驻军和军事机关（潢川夹潢水有南北两个城，中架石桥相联），一时大军云集，我国的不少作家和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当时也都在潢川。

颍州三校迁到潢川后，离开了安徽本土，经费和校舍都大成问题，苏、王二校长三天两头去找李宗仁，得到的回答总是“李长官现在军事繁忙，无暇接待”。第五战区是桂系势力的中心，一些桂系人士就主张把迁到潢川的颍州三校师生编入活跃在潢川及五战区各地的广西青年军团（由广西开出时，均为广西人，后渐吸收非广西籍青年学生参加）。而一些左派人士却对颍州三校师生风言风语地说：“抗战期间，人家都到前方去，安徽人却向后方跑。”苏、王二校长在潢川既受桂系当权者要改编三校的压力，又遭到左派人士的讥讽，终日寝食不安。苏家祥先生坦率地对学生说：“现在有人要把我们三个学校编到广西青年军团去，你们

都已经晓得了。我们从阜阳迁校来潢川时，我和王校长受你们家长的重托，要我俩带你们到后方读书，现在要是在潢川把你们编到广西青年军团去，我和王校长都感到对不起你们的父兄。现在我和王校长想给汉口教育部陈部长和六安的安徽省教育厅杨厅长请示解决办法，很快会有结果的。”

正在这时，方治和邵华由六安乘车至潢川，分别召集颍州三校学生讲话。我们颍中初中部一年级三个班当时住在距潢川15里的樊村铺乡间。苏家祥校长在樊村铺汽车站召集我们讲话，方、邵二人乘汽车赶到会场。邵华因为是颍州中学的校友，集会主要由他讲话。邵华说：“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在他乡相见，心里感到万分的难过。”说着呜咽起来，讲不下去了，过了好大一阵，又才接着说：“你们从阜阳到了潢川，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我和方先生在六安看到苏校长给安徽教育厅杨厅长的告急电报后立即连夜从六安赶来潢川。我和方先生这次从武汉到六安来，是奉教育部陈部长的指示，要把安徽的学校迁到后方去。现在有人说风凉话，要大家都到前方去。都到前方去，后方就不要了？长期抗战，要有前方，也要有后方。有人说你们向后方跑，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怎能执干戈、卫社稷！”邵华还拍着胸脯说：“就是我邵某人说的，你们都到武汉去，一切由我和方先生负责。方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我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安徽省党部委员，看到你们流落在潢川不管，是我们失职；我们不去顶那些说风凉话和想扩充自己势力的人，也是我们失职，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作中央委员？我和方先生受安徽3000万父老的重托，一定要为安徽留下你们这批读书种子。安徽是人文荟萃之邦，文人学士辈出，虽然处在抗战时期，安徽文风也决不能断。”方治先生因为桐城方言太重，只简单说了几句：“你们到武汉去，潢川和安徽这边的事，由我和邵先生负责；到了武汉以后，陈部长会负责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四

约于六月中旬，颍州三校师生即由潢川向武汉进发。为防备由信阳乘火车遭受日机空袭，苏、王二校长决定三校师生徒步翻越大别山，取道光山、经扶（今新县）、中馆驿、宋埠，奔赴武汉。

这时，正是梅雨季节，霪雨霏霏，山高路滑，常遇山洪暴发，中断途程。且山中野狼成群，出没无常。约于六月下旬，三校师生陆续过宋埠，由仓子埠乘轮船抵达武汉。颍中高中部及初中二、三年级学生，颍师高师部学生均住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颍中初中部一年级三个班、颍州女中、颍师简师部学生住武昌小朝街私立安徽旅鄂中学。

约于六月下旬，安徽的四所省立临中、颍州三校、安庆中学及巢县县中，都已先后到达武汉；徽州三校因在皖南山区，没有迁校。1938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武汉沸腾起来了。“武装保卫大武汉”、“武装保卫全中国”雄壮激昂的歌声，整日整夜响彻三镇上空；游行队伍整日整夜地高唱着“中国不会亡”的悲壮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扣人心弦的献金台前，有乞丐献金，有人力车工人献金，有不远万里回国的华侨献金，有的甚至连钢笔、手表、衣服都当场献了出来。我们在武汉真正受到了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迁校到武汉的同学中，年龄大一些的，有不少人辗转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去了，也有不少人考入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了。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因去延安的同学不愿带我们，战干团不愿招我们，我们只有跟着苏、王二校长走。就在此时，我们已听到要把迁汉的安徽学校改为国立中学，说校址设在湖南洪江。我当时还查阅了地图，知道洪江在沅江中游，是个出产桐油的大镇。

约在“七·七”一周年过后20天光景，我们看见《武汉日报》

（当时因《中央日报》在长沙出版，《武汉日报》实际上居于国民党中央报纸的地位）第一版登载“国立安徽中学”的通告，校长为杨廉，校址设在湖南。这个通告登出后不久，在武汉的安徽各学校分别乘船入湘，首先过洞庭湖到常德。同时，国立安徽中学在长沙和常德分别设立安徽流亡学生登记处，收容皖籍流亡学生。教育部还同时设立了安徽中小学教师团，收容安徽流亡出来的中小学教师。当时任监察院皖赣监察使的杨亮功先生（安徽巢县人，早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两次出任过安徽大学校长）晚年曾在台湾评论说：“抗战时期，有组织地把战区的学校内迁，是始自国立安徽中学”（台湾版《杨亮功先生年谱》）。杨氏上述评论是真实的。1938年五六月间，安徽各省立中学的西迁，是教育部经由方治和邵华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国立安徽中学的成立，也是早有准备的。

杨廉出任国立安徽中学校长后，安徽省教育厅长由方治接任。从1938年秋，方治先生又先后在安徽设省立临时中学，从四所增至九所。

五

国立安徽中学的通告刊登出来时，学校领导已派人到长沙和张治中洽谈校址设在湖南的问题。湖南作为国家重心由东南沿海转向西南的过渡，如陆军大学由南京迁至桃源，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为国立政治大学）由南京迁至芷江，江苏省立医学院由镇江一度迁至沅陵（后再迁重庆北碚），《中央日报》社也由南京迁至长沙。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二百师亦驻扎在桃花源附近。所以教育部在筹设国立安徽中学期间，即考虑把校址设在湖南，至于设在湖南的什么地方，这就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有关系了。

据我们当时在武昌听说，张治中常从长沙到武汉，也常与在武汉的安徽乡亲会面。有人对张治中谈起教育部筹设国立安徽中学的事，张治中表示“我以安徽同乡的资格，欢迎国立安徽中学设在湖南，建校经费如有困难，湖南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校址、校舍，要各地全力相助。”张治中还为此找了教育部长陈立夫，陈表示同意在湖南建校，并介绍张治中召集从安徽迁至武汉的各中学校长进一步商谈此事，苏家祥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苏先生对我们说：“我们七八个校长都一致同意国立安徽中学在湖南建校，杨厅长也同意大家的意见，邵（华）委员和方（治）委员也参加了会议，都支持国立安徽中学迁至湖南。不过杨厅长在会上表示，校长最好请别人担任，非他担任不可时，只负个名义上的责任，另请一位先生代理校务，自己要到重庆或成都治病。”苏先生还说：“张治中说可以从经费上帮助建校，但学生个人经济困难，还要请湖南省政府拨点钱给学生，让他们作为汗衫、毛巾、草鞋之用。张治中已在会上慨然应允，发给学生每人草鞋费五元（当时约够一个月的伙食费用）。 ”

张治中七月在武汉与安徽各校长会谈时，早已有了一个建校方案。原来他在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于1938年5月和6月专程到湘西作了一次全面的考察，几乎湘西各县都曾到过，也征询了各方面的意见。张将军考察湘西后，得到一个深刻的结论，就是湘西教育落后，曾与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商量，想把长沙、衡阳一部分中学迁往湘西。但朱厅长对此不同意，并说“把长沙、衡阳一部分学校迁到湘西，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很难实行，最好的办法是在湘西各县筹建新的学校。听说南京、上海、苏州、扬州和安徽各地的教师，不少人住在汉口难民所里，生活困苦，工作无着。这些教师富有教学经验，湖南若在武汉招聘一批苏、皖教师，在湘西建立新的学校就没问题了。”朱经农原为上海光华大学校长，曾在南京、上海的大学担任教授多年，为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又